

我的成長和求學生涯

——兼憶聯合書院的往事

鄭國漢

一 內地生活

1952年，我出生在汕頭市潮陽縣沙隴鄉東波村。記得小時候我經常替祖母拿着放置香油和齋菜的竹籃子，跟她到不同寺廟去拜佛、拜菩薩、拜潮汕地區著名的祖師公，也學會了唸幾句經文。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在眾多孫子女中（祖母有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她似乎相當疼愛我。

至於比較清晰的記憶，開始於人民公社運動時期。大概在1958年之後，我們村的生產隊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飯不夠再煮」，「向共產主義過渡」。現在我們知道，大躍進最後導致了大饑荒，但是作為孩子，我當時的感受跟今天很多人說的不太一樣。在人民公社裏，大家一起吃飯，我覺得很高興。當然，今天看來那是一個很荒唐的鬧劇。我們都把自己家的飯桌搬到人民公社食堂裏，大家一起吃。平常在家裏吃飯，就是吃稀飯，再加點番薯；只有過節的時候，才能吃到白米飯。到了人民公社，大家都一下子過上好生活了，天天吃白米飯，無限制地吃，不夠就再煮，吃得興高采烈。所有社員都從家裏把米送過來，本來要吃一年的大米，可能三四個月我們就把它吃光了。

到了第二個階段，糧食不足，食堂就改變了政策，不再煮飯，只是煮稀飯，而且不是隨便想吃多少就多少。稀飯煮好後，每人分一份，按照年齡大小，成人跟孩子領到的份量不同，然後再拿到自己的桌子上吃。慢慢地，食堂的意思就不大了，最後食堂解散，大家就把飯桌搬回家去。我那時候還是小孩子，所以覺得蠻好玩，不需要去擔憂吃飯問題，這是大人操心的事情。

* 本文源自2022年11月28日下午於嶺南大學校長辦公室的訪談（訪談人：嶺南大學環境史和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光臨、助理主任張雷、研究員及歷史系講師毛升），由毛升節錄整理，經作者修改，並同意發表。

大饑荒發生後，很多人日子過得很苦，但我們家還好，因為父親在香港。他經常給我們郵寄東西過來，比如豬油、麪粉、糖、舊衣服、洗臉的面巾（有些人把面巾用來做包裹袋，包裝其他東西）、打火機和火石，等等。因為有了這扇「南風窗」，我們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雖然我聽說有些地方發生了大饑荒，比如表哥告訴我們，他從北方坐火車回來，看到很多流離失所的難民，有很多乞丐。我們這裏沒有饑荒，再加上父親的關係，生活不算太壞。米飯吃不飽，還可以吃魚，畢竟家在海邊，水產豐富也不貴，儘管那些魚也不算是好的魚，最常見的是小剝皮魚，但也有一定營養。實在還餓的話，那就加一個番薯。因此我在內地的生活還是相當高興的，也不知道煩惱。

我在國內上學至小學三年級上學期。在鄉村學校上學很輕鬆，沒有多少功課。大躍進時期，基本物資非常短缺，老師要跑到縣城裏給我們買筆記本、鉛筆。每位同學一個學期就只有一本筆記本，所以寫字都不能寫得太大，否則就不夠空間做作業。鉛筆的質量很差，寫幾下就斷了。除了筆芯容易斷之外，木料筆身不但黑而且有孔，我們開玩笑說它是棺材木做的，不是真正木頭做的。我們功課比較少，白天就聽老師講點課。我還負責耕地種菜，菜有收成就拿去市場賣，這些錢就用來支付我們班活動的費用。我對這所鄉村學校的情況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學校應該不大，學生不多。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要去旁邊一個叫東仙的鄉（或者村）去上課，我們還因此抗議過，因為路太遠了；後來我們回到東波村上學。記得我們的學習頗為輕鬆，課餘時間可以去小溪抓魚。學校還發動我們今天支援這個家庭，明天幫助那個家庭下田幹活、除雜草、踩水車。上課學的東西應該不多，老師在課堂上就聊聊以前的工作經驗、人生經歷，吹吹牛；記憶中好像有一位當過兵。我們也開始學習普通話，因為我們潮州人平時只講潮州話。有時候我們玩遊戲，例如學生分兩隊，第一隊先出發，不說去哪裏，但留下痕迹給第二隊追蹤。總之，在農村讀書沒有很多壓力，十分愉快。

二 偷渡香港

1961年我九歲的時候，我們全家移民到香港。前面講到父親在香港，他就在我三姑母的雜貨店裏面打工。父親在國共內戰前就在香港，後來回內地結婚生孩子，就沒回去香港。本來可能也沒打算要回香港，但是1958年那種情況實在太艱苦了，他決定回香港打工。那時候要合法地去香港，必須領到一份申請表，填完表格後，獲得中國政府批准才能到香港。如果沒有申請表，根本就甚麼都不用說，只能偷渡。在我們老家，大家都知道父親曾在香港生活、工作，現在要回去，所以較容易領到申請表，並獲得批准。我們後來移民香港，也是因為父親是香港的「華僑」。中國政府對華僑家庭的政策有一定的優惠，只要有家人在香港，就可以申請其他家庭成員來港。申請獲得批准後，我和母親及妹妹就動身去香港與父親團聚。

當時內地人進入香港大概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坐火車到羅湖，再入境香港。香港方面每天給予從內地入境並長期居留(所謂「單程證」)的人數有限額，不是中國政府批准了就可以合法入境，事實上獲批准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香港方面的限額。那些超額的人怎麼進入香港呢？還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我們就是走這條路。我們先從潮陽出發坐車、坐船到汕頭市集合，接待人員介紹國家的政策，具體內容不記得了，但記得他們呼籲到香港和國外的人(前往泰國和柬埔寨的大多是潮州人)往後繼續支持國家。從汕頭坐長途汽車到廣州市，途中經過惠州的博羅，第一次吃客家人的梅菜。之後從廣州到珠海的拱北，再從拱北關口進入澳門，然後澳門那邊安排我們偷渡到香港。其實，這種入境香港的方式是官商合作，中國政府把我們這批人交給偷渡集團。偷渡集團不是免費白做的，我們家每個人交給偷渡集團的錢，可能就是父親幾個月薪水。

我跟母親、妹妹一同進入拱北關口，然後在澳門住了下來。因為這是半公開的事情，父親跟香港的親戚也都收到通知。父親買了一些東西到澳門看望我們，又找到澳門這邊負責幫助我們偷渡的人打招呼。其他計劃偷渡到香港的人的香港親戚也來探望，有些買了口香糖給他們品嚐。只能咀嚼卻不能吞下的口香糖，我一輩子第一次見識。到香港後，還見識了更多新東西，例如在潮陽沒有看過的蘋果。

偷渡集團的人跟我們說：「不用擔心，很快就安排你們坐船去香港。」有一天早上，真的就輪到我們了。那一天是我一輩子最難過的一天。天還沒有亮，我們帶了行李到一條澳門的漁船上，船的規模比較大，我們大概十幾二十個人坐在船底。因為我沒出過海，暈船暈得很厲害，從一大早到下午，也不知道漂流了多少時間，總之是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非常辛苦。接下來，我們再換乘到一條香港船上，晚上在香港靠岸。偷渡集團交代，船一靠岸就要往上衝。於是船一靠岸，我們就拼命地衝。衝上去後，我發現岸上附近已經停了好幾輛小車，把我們載到各自家裏。看來偷渡集團有相當規模，既是非法偷運移民，又像是半官方性質。這種偷渡的方法也跟香港當時的移民政策相互配合，那就是所謂的「抵壘政策」，我後來才知道有這個政策。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認識到中文字的好處。因為我跟母親、妹妹走散了，她們進了一輛車，我進了另外一輛車。那些開車接應的人不知道應該送我這小孩子去哪裏。我不會講粵語，講潮州話或者國語都沒法交流。幸好我識字，就把父親的名字和地址都寫了下來。雖然語言不通，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寫下來的文字交流。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深深感受到中文雖然讀音不一但書同文的好處。

第三種進入香港的方式，就是非法離開內地，非法進入香港，既有爬山的，也有水路游泳的，但兩邊的邊防軍都可能開槍攔阻非法移民。我在唸大學時有一位同學也是潮州人，當過紅衛兵，在武鬥中輸給敵對紅衛兵組織後游泳逃亡到香港。在宿舍裏聽他講紅衛兵故事很是有趣。

三 在港求學

我們來香港後，大部分時間就住在九龍城和新蒲崗之間的東頭邨。那個地方現在還是叫東頭邨，但是我們住過的那些房子都被清拆了，重建了新的樓房。我唸小學、中學的時候，那個地方就叫「東頭邨徙置區」，附近除了九龍城寨之外，其他平房基本上都沒有了。早期住在那些平房或破破爛爛的寮屋的人，在房子被清拆之後就搬到樓高七層的徙置大廈裏去。

那我們是怎麼得到這樣的房子呢？這種徙置區起源於1953年石硤尾大火，之後香港政府開始興建多層式大廈安置災民。東頭邨一帶的樓宇一般是七層高，可能是電梯的成本太高，這些徙置大廈都沒有電梯。七層應該是無電梯樓高的極限，我們稱它為「七層大廈」。政府開始清拆平房及寮屋並分配這些徙置房之後，香港部分老百姓就藉機發財，寮屋也愈拆愈多。當時，假如有房子給香港政府清拆了，那房東就會發財。我們租住的房子屬於一位也是潮州人的房東，她知道政府即將清拆她的房子後，就把房子分租，拆遷後她家和租客都可以獲得「分房」（搬進徙置區）資格。她把原來的廚房改為上、下兩個出租單位，本身這個廚房就很小，小到連一張正常的牀都放不進去。如果要放牀，就必須把牀板鋸短，因為我們需要地方放「火水爐」（煤油爐）用來煮食。就這麼小的廚房，還被一分为二。父親住在雜貨店裏守店，我和母親、妹妹三人就住在廚房的下半部分。廚房的上半部分呢？房東還分出一個閣樓，再租給另外一家人。他們只是名義租客，並不在那裏住，實際上住在旁邊的九龍城寨，在家裏用機器織毛衣為生。他們也是潮州人，之所以要租那種「房子」，不是因為那裏真的可以讓他們一家三口居住，而是為了等待政府進一步安置。房子拆了，就可以由政府替他們解決住房問題了。房東樓上還有一個房間，她把它租給第三個家庭，他們是在寫字樓工作的白領。相對父親的雜貨店店員和母親的紗廠女工（每班十二個小時）工作，白領是令人羨慕的工作；和我們一樣，他們也住在平房裏。

除了自住外，房東把房子其他部分分租給三家人，賺了不少錢。她收取的不只是多少個月的市值租金，更是一筆可觀的金額。當然，我們不太願意住在小廚房裏，但也藉着這個機會，享受到政府將來安排的徙置房。政府徙置房的租金很便宜，房子雖然簡單，甚至可以說簡陋，但質量好，是用鋼筋水泥造的，很結實，不用擔心颱風會將房子颳倒。

我們能分到這樣的徙置房，很開心。我們原來的房東當然更高興了，她通過這麼一番操作，除了從三個租客拿到幾筆現金之外，她分配到的房子面積最大，而且還有大露台。不記得她有沒有成功分到一個鋪位，但相信她嘗試申請過，因為她在家裏放了多個裝有糖果餅乾的玻璃罐，說她家樓下的客廳就是一個小商店。這可能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生存智慧。

徙置大廈可以說是香港獨有的時代產物。徙置大廈的房間分成一格一格，房子不是很寬，空間狹窄，房間外面的走廊很長，四通八達，家家戶戶都與

走廊連接，幾乎所有家庭都在家門口的走廊擺放一個放置火水爐和鍋的箱子，但不妨礙行人通過。房間裏沒有衛生間和廚房，大家都要用公共水龍頭、浴室和廁所。

一家人口必須足夠多，才能分到一整個單位。一個單位通常用沙磚分成兩邊，分隔成兩個小單位，大小不同，分配給兩個不同家庭。這道分隔牆的最高部分不是密封的，讓空氣可以流通，但隔壁說話大聲是可以聽到的，私隱度不足。那些房子的租金只有幾個級別，只要說要交多少租金，大家就知道房子有多大。如果家庭成員多，租到整個單位，裏面就可以搭建兩三個房間。如果家庭成員少，比如我們只有四個人，再加上未夠十歲的兒童當成半個成人，就只分到整個單位的三分之一左右。整個單位一個月的租金是28元（港元），如果分成兩個單位，每家要交14元。我們家是面積最小的單位，交10元。要申請到更大的單位，家裏就必須加添子女。後來，我的妹妹和弟弟出生了，我們家就申請擴大住房，最後搬到那種要交14元租金的單位裏去。

國內的小學不是很正規，但到香港後，上的就是相對正規的學校了。剛來時我因為不會粵語，不是很適應，報讀的班級比在農村時後退了兩年。我上課可以跟老師說普通話，他們也會一點普通話，能交流。但說到英語，我可就無能為力了。我以前完全沒接觸過英語，最怕上英語課。全班同學齊聲朗讀的時候，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唸。但是當老師叫我獨自站起來朗讀，我就不會唸了。那證明我唸英文書是假裝的，有點像濫竽充數。

我最初開始唸書的學校是「天台小學」。天台小學是香港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大部分都開辦於1950至60年代，這段時間香港出現了嬰兒潮，再加上大量移民進入香港，導致人口激增；政府缺乏資源投放在教育領域，官立學校學額嚴重不足；私立學校學費太高，一般家庭無法負擔。幸好徙置大廈上面有天台，於是一些志願團體或宗教團體就在天台設立小學，這成為一般家庭的兒童接受教育的途徑。我先在天台小學讀過一段時間，應該是一到兩個學期。記憶中該校似乎是浸信會辦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不知道有甚麼特殊關係，居然能夠安排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小學生登上一艘美國軍艦參觀，而且在艦上還有冰淇淋招待。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淇淋，非常喜歡。

當時能進天台小學唸書已經不錯了。不久，出現了很多更好的學校，天台小學再沒有生存空間。我對就讀的天台小學不是很滿意，父親就和我去外面找學校。有一天我們經過一所學校，名叫基德小學，是聖公會辦的，位處新蒲崗旁，在東頭邨和黃大仙徙置區一帶的交界。進去詢問有沒有招生，他們就錄取了我，作為三年級學生於下學期入學。我就從二年級的上學期跳到三年級的下學期，追回我降級的部分時間。我在內地唸書時中文、數學還是可以的，但英文真的不行。我很幸運，基德小學對學生管教很嚴，給我一個很好的起點。有一次在學校補習後，我沒有回家，跟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的空地踢足球，被學校發現，受記過處分。老師責備我們：為甚麼不回家？回家用功去！

我唸書非常用功，除了做學校的作業，還學習從書店買來的中、英、數教材和做相關的作業，所以成績不錯。第一年進去基德小學，就考得全班第一，把原來第一名的學生氣得轉校了。但是我的英語還是不太行，於是就去一所名叫「易通」的夜校補習英文，不過好像沒有取得甚麼進步。後來父親找到朋友的一個姪子，由他來單獨教我，我的英文從那時候開始上了軌道。

小學畢業之前，我參加升中會考。那年的升中會考有三萬多人參加，同一張試卷，全香港凡是要報讀中學的小學生都要應考。我沒有辜負老師的教導和加班補習，會考成績是全港第一百幾十名。當時的會考制度容許學生報讀任何一所學校，不分區，只要成績夠好，就能入讀心儀的學校，不管它離家多遠。上面說過，基德小學是聖公會辦的，小學校監就是拔萃男書院（男拔萃）的校長。基德小學地方小，所以學校有機會去男拔萃辦年度運動會，那裏地方非常大，我非常喜歡，升中會考報名時它就是我的第一志願。報紙都會把成績刊登出來，只要用考生號就可以查到排名。公布成績的那天，父親一早就去買報紙，那張報紙可能在我們家裏保存了幾十年。兒子會考成績能在一百五十名之內，考進男拔萃，還拿到政府獎學金，父親覺得特別驕傲。

男拔萃是香港的一所貴族學校，但我們這些貧寒人家子弟也可以通過升中會考入讀。當時男拔萃每個年級有四班，兩班是從私立的拔萃小學直升上來的，其他兩班是通過升中會考進來的。我在男拔萃的成績並不算出類拔萃，因為那所學校就像另外一個世界：部分同學在家裏也說英文，相反，英語不是我的強項；誰在中文、中國歷史以外的課堂上說中文，都要罰款，雖然罰額不大。

男拔萃絕大部分的老師都很優秀，而且盡責，但也有少數老師不太負責任，無法激發起我發奮學習那門課的士氣。一旦遇到這種老師，我也好像就沒心思認真學習了。到今天我還記得一位來自加拿大的數學老師，教學特別不認真，經常不上課，只是在課堂跟我們打一聲招呼，然後叫同學自修。我在男拔萃待了六年，合計中學五年，再加一年準備大學入學預備班。高中畢業後，多唸一年就可以報考香港中文大學，多唸兩年就可以報考香港大學，我選擇了報考中大。

四 發奮中大

進入大學後，尤其是後面兩三年，是我發奮的時候。我被中大錄取後，學校首先要求我在開學前的暑期參加普通話培訓。開辦普通話培訓班的原因是：除了外國人講英語，本地老師講粵語，內地過來的老師講國語之外，更多人使用中國不同地方的方言，而普通話的訓練不但令學生聽懂國語，也幫助其理解老師的方言。我進入了中大的聯合書院，相對於中大當時的其他兩

所書院——崇基學院和新亞書院，它是一所比較貼近本地、具工商背景的書院，而我一開始就選了商科裏的會計專業。

我進入中大後不久，就經常跟左派學生在一起。1970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學生會都由左派學生控制。我入學不久，左派學生就找我做思想工作。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辦學生報紙，比如《聯合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他們的立場比較公開，光明正大地親中，被稱為「國粹派」。但還有一批左派學生比較隱蔽，不公開身份，帶點地下色彩。那時候香港大專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口號，叫做「放認關爭」。這四個字代表四個短句，即「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四個短句中，最受大專界重視的是中間兩句，簡稱「認中關社」，就是要為人民服務，與人民打成一片。

我跟他們一起，主要參加他們的學習班，還讀過《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矛盾論》、《論十大關係》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經典共產黨文獻和毛主席文章。街頭有示威，示威者跟警察發生衝突，報社的人就在旁邊觀察，回來寫文章，發表在《聯合學生報》上，但我並沒有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還參加過他們組織的「憶苦思甜」活動，去澳門氹仔參觀炮竹廠。當時炮竹業仍是氹仔最主要的手工業，居民大多從事與炮竹有關的工作，其中童工甚多。因為工作環境惡劣，安全措施差，經常發生爆炸。炮竹廠爆炸後的恐怖淒慘場面，令目睹者不寒而慄。左派學生和當地接待我們的工人說，這些鞭炮廠曾經炸死了許多勞工，其中不少還是兒童，非常殘酷。

1971年「林彪事件」後，我就徹底不信左派了。我今天雖然跟左派老同學還有聯繫，有時一起吃飯，他們當中有些跟我一樣也變了，但在「林彪事件」後還相信共產黨中央一直都是正確的左派學生，我跟他們基本上再沒有聯繫。

我在聯合書院時期親近左派學生，有一個很不好的後果，那就是我對正在唸的那些課程產生了一種負面情緒。我覺得自己在中大所學的不正是資本主義的一套嗎？只不過是在學做生意，只為賺錢，沒有甚麼社會關懷。因此我對會計專業不是很感興趣，覺得這些知識不重要，甚至產生鄙視的態度，學習也就不是很勤奮，情緒也比較低落。幸好我在唸一二年級的時候，上了一位台灣人老師的課，課程名稱叫「貨幣與銀行」(Money and Banking)。他講述英倫銀行在面臨黃金（或者外匯）流出時，如何利用提高利息把黃金（外匯）留住，保證資金不流走。但後來市場了解這個道理——英倫銀行提升利息就說明它出問題了，所以有些人加快把資金撤走。我聽過以後覺得經濟學還是有真學問的，產生了興趣，開始自學。後來我就不想唸會計學了，轉唸經濟學。

給我帶來啟蒙的那位台灣人老師名叫余國燾，教課很認真，講課很投入。他在劍橋大學考取了碩士學位，並沒有攻讀博士學位，也沒有很多自己的著作，主要成就是把一些英文的經濟學名著翻譯成中文。他說他跟孔子一樣，「述而不作」。他很有個性，上課時穿上黑色的學士或者碩士袍，他說是用來遮擋寫黑板時掉下的粉筆末，避免弄髒衣服。

我決定從商科轉向經濟學，這在當時是很奇怪的，因為似乎更多人想從經濟學轉學商科，雖然這兩個學科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密切，只是各有不同側重而已。從商科轉到別的學科，是比較稀罕的事情，大家都想學商科，更好找工作。那一年聯合書院商科同一班上卻有三個人轉系。除了我從商科轉到經濟學，另外一位名叫蔣慧民，去了中文系，同時學習音樂，後來除了正職，還在不同學校包括大學的合唱團任指揮。第三位名叫楊寶熙，是一個女生，選擇去唸社會學。楊寶熙後來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中學時代就成為197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雜誌《70年代雙周刊》中的一員，該雜誌似乎是當時唯一一份左派期刊，創刊時鼓吹無政府主義，後來一部分人轉向托洛茨基主義，還參加了保釣運動。楊寶熙在中大的時候先後當過《中大學生報》編輯，參加過中大社服工作隊，1975年還成為中大學生會第一位女會長。她參與社會抗爭，挑戰殖民地政府，是中大學生中的「社會派」女豪傑。在聯合書院的最後一年，她聽說我將來想去世界銀行(World Bank)工作，就問我：「你是想去世銀『撈』？」意思大概是問我是否想在世銀這些聯合國機構混飯吃。雖然我並沒有回應她的問題，也不知道她是否還記得向我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我後來在世銀實習的經歷及畢業後的工作選擇可以說是以事實作出了回答。

總之，決定唸經濟學之後，我就必須好好做準備了。以前我對數學沒有下太多功夫，因為我唸會計學，有沒有扎實的理論數學基礎都無所謂。但是當我決定要轉唸經濟學，那就需要打好數學基礎。我花了整個暑期，將數理經濟學的教科書從頭到尾翻完一遍，再從頭到尾把那本書所有習題都做通了。我們當時用的經濟學教材都是西方人寫的：經濟學教材用的就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的《經濟學：導論分析》(*Economics*：



鄭國漢(前排右三)與經濟系同學於聯合書院入口處，最右邊蹲坐者為經濟系系主任薛天棟。(圖片由鄭國漢提供)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1948])，該書銷售量高達四百萬冊，翻譯成四十種語言；他是美國第一位經濟學諾獎得主。數理經濟學的教科書也非常經典，書名叫《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作者為蔣中一，美籍華人，長期在康涅狄格大學任教，也曾經到中大新亞書院以及香港嶺南大學的前身嶺南學院當過訪問教授。我轉攻經濟學後，應該說相當成功，大學畢業時拿到一等榮譽學位，同年崇基學院與新亞書院也各有一名經濟學本科畢業生獲得一等榮譽學位。

大學四年級我就申請去美國讀研究院。我為甚麼想讀研究院？因為我唸經濟學的時候，經常考慮一些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如果這些國家能在制訂經濟規劃方面下功夫，使經濟運作得更好，是否就可以脫離貧困呢？我知道世銀的工作主要就是透過給發展中國家貸款，以及提供經濟政策方面的建議，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我當時的一個願望就是去世銀工作，然後再去落後國家工作。這是我計劃讀博士的初衷，後來卻發現世銀的工作和我想做的有所出入。

我幸運地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錄取通知書。為甚麼申請入讀柏克萊呢？這跟中大左派的影響沒有關係，反而是跟一位美國左派教授有關。我在中大最後一年正在考慮申請哪所美國大學時，碰到一位來自柏克萊的教授沃德 (Benjamin Ward)，他是研究南斯拉夫及蘇聯經濟增長模式的專家。那時他在中大授課，我上他的課，好像是一門題為「比較經濟學」之類的課程。我跟他說想進研究院學習發展經濟學，他說柏克萊的發展經濟學不錯，可以申請。既然他這麼說，我就完全沒有考慮申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也有這一專業，我報了名，但沒有被錄取。我也申請了其他幾家大學，包括多倫多大學和密歇根大學，但最好的還是柏克萊。在個人財務上，我也是蠻幸運的。當時聯合書院設有幾個獎學金，最高額獎學金是「邵逸夫獎學金」，我幸運地獲得那個獎學金，金額是15,000元。在1975年，15,000元的獎學金於數額上已經不少了。當時加州大學跟中大是姐妹學校，加大所有校區有一個聯合機構給到加大留學的中大學生減免學費。再加上「邵逸夫獎學金」，我在經濟上還是比較寬裕的。

在中大慶祝六十周年之際，我回憶昔日在母校求學的情況，既懷念也感恩。母校教人不倦的老師與濃厚的學術氛圍，幫助我打下後來讀博及學術生涯不可或缺的堅實基礎；我在母校也與多個學系的同窗建立了可貴的友情。在感恩之餘，我謹祝願母校下一個甲子更加輝煌，為香港、祖國及全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鄭國漢 香港嶺南大學校長，中大校友 (75聯合經濟)。